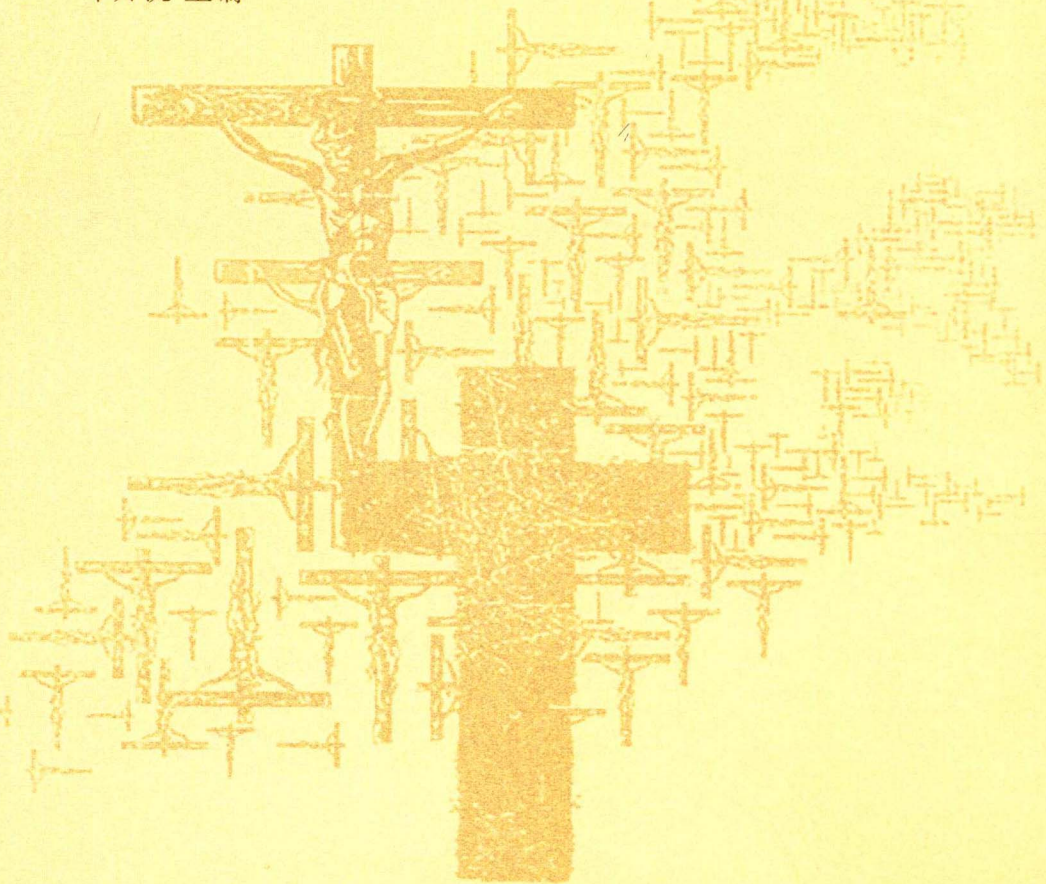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文库

章开沅 主编



“扭曲”的十字架

——伪满洲国基督教研究

徐炳三◎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基督教史论丛刊 第1卷第1期(2014年第1期)

第1001—100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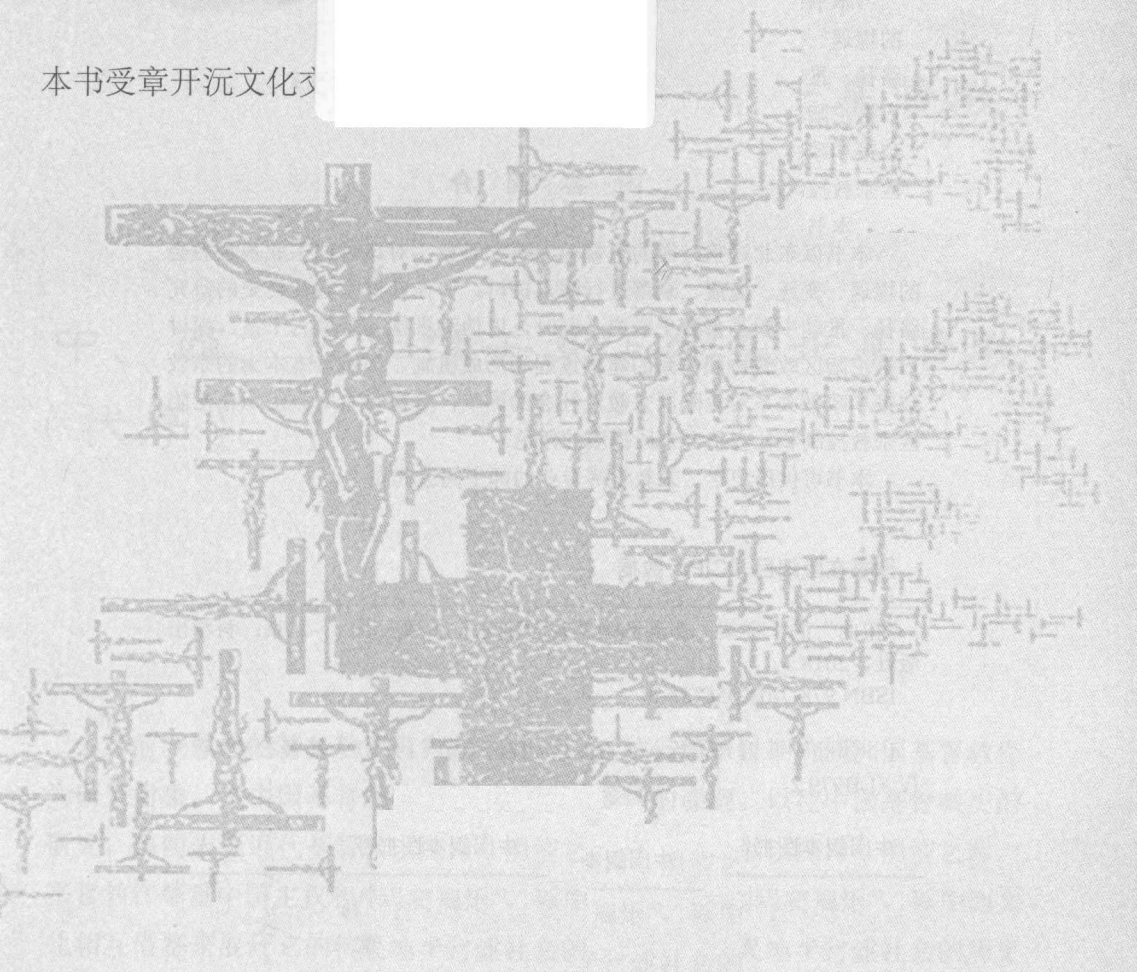
“扭曲”的十字架

——台湾传教士林德顺研究

林德顺 著

中国基督教史论丛刊 第1卷第1期

本书受章开沅文化文



“扭曲”的十字架

——伪满洲国基督教研究

徐炳三◎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教为研究对象,对该时期东北基督教会的境遇、变迁、发展、衰落进行深入探讨,旨在通过宗教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同时,以伪满洲国基督教为个案,探讨日据沦陷区政教协同体系的建构过程和形成机制,揭示日本本土的宗教政策和政教关系对沦陷区宗教及社会的影响,分析日本宗教组织在沦陷区宗教控制和社会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书可供历史学、宗教学等专业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扭曲”的十字架:伪满洲国基督教研究 / 徐炳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03-056238-8

I. ①扭… II. ①徐… III. ①伪满洲国(1932)—基督教史—研究
IV. ①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3529 号

责任编辑:任晓刚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楠竹文化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字数:280 000

定价: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西、日三维关系下的东北基督教 (代序)

当前区域性的基督教研究方兴未艾，而以抗日战争时期伪满洲国基督教作为研究对象，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最富挑战性的课题。以往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自明末至近代基督教主要是在中、西二维关系下加以探讨。明清之际，基督教在尊重中国主权和中国传统文化前提下，遵循“利玛窦规矩”，以中西文化相互借鉴来展开它的传教工作。近代基督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环境下运行它的宗教职能。此时基督教的保护伞，是靠列强的船坚炮利，不像明清时期那样靠中国士大夫的保护。明清也好，近代也好，基督教基本上走的是中国本土化的道路，本土化的实质就是以中国的文化来调适和改造外来的基督教。但自 1931 年日本侵华以来，东北基督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入侵中国，使基督教处于中、西、日三维关系下的博弈与抗争。基督教的命运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境，基督教信仰的圣神性遭到了践踏。此时，东北基督教生存和发展的课题，再也不是以往常态化下区域教会的共性问题，诸如“本土化”“三自”“中西文化适应与冲突”等。教会正常的活动被搁在了一边，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对“求和”与“反战”的选择。尽管时间短暂，至 1945 年抗战胜利不过十几年来，但东北基督教却演绎出了在“宗教与战争”环境下中国大陆基督教区域史上从未有过的、鲜为人知的沦陷区教会政教关系的方方面面。

中、西、日三者博弈下的东北教会，连近代中国教会所拥有的一点权利和“话语权”都消亡殆尽，当教会与列强发生冲突时，还有所谓“教案”可言，中

西双方还可以在“国际法”下，做到依法立案处理，而在日本统治下则荡然无存了。东北教会成了任人宰割的“羊群”，圣神、纯洁的十字架插上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关东军刺刀。这也可以说是日本对待东北教会策略最狠毒的手段，关东军拥有伪满洲国行政和司法上的大权，通过它对基督教实行全方位的控制，而警察和宪兵是他们对待基督教“异议分子”经常使用的工具。西方传教士，尽管他们一致反对日本的侵华行为，但日本慑于英美国家的压力，对待他们的策略与对待中国人的教会毕竟有所区别。西方传教士并不是日本人最终防范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采取各种的手段把东北基督教会改造成顺服他们统治的工具。最令中国教会扼腕的是日本要把“皇民化教育”推行到基督徒身上，要他们祭孔和敬拜神社，设立神龛，供奉日本天照之神，演绎出了现代版的“礼仪之争”。而在这场“礼仪之争”中，罗马天主教会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清代康熙皇帝在“中西礼仪之争”中，为中国教徒祭孔作了苦口婆心的辩解，仍遭到罗马教廷的反对，而伪满洲国的祭孔却得到罗马教廷的允准，明清之际的“礼仪之争”由此而结束。这不能不说是日本作为法西斯同盟之使然。东北的天主教也因教廷与伪满洲国特殊的关系，享有与新教迥异的宽松政策。

日伪政权下的东北基督教是日本侵华战争孵化出的怪胎，对它的探讨和研究远远超出了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范畴，而战争状态下错综复杂的中、西、日三维关系更是伪满洲国基督教研究的重要内容。徐炳三博士《“扭曲”的十字架：伪满洲国基督教研究》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探讨。作者以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大量、详细的历史资料，尤其是日文档案，通过层层抽丝剥茧，揭示出日本对基督教会利用和控制的历史始末。作者并不仅仅囿于伪满洲国基督教个案的限制，而是以更高的视野来探讨抗战时期各种宗教的命运共同体，以沦陷区的政教关系的建构与形成作为全书的切入点和主线，从中归纳和总结出沦陷区宗教命运的普遍模式，淋漓尽致地再现出日本在中、西、日三维关系中所扮演的侵略者的主导角色，三维关系成了“三位一体”。中国人的基督教会变质为日本人的教会。东北的基督教史，再也不是单纯的宗教史、区域史，而是一部被战争扭曲的基督教史。

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以新视野、新观点、新体系研究沦陷区的基督教会。此外，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面对当前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否认日本侵华历史的嚣张气势，该书的付梓问世，无疑是一本很好的

教材。它让读者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除了以血腥的大屠杀摧毁中国人的肉体外，精神上也不给中国人信仰留下一丝真空地带，还以武力相胁迫，把基督教改造成神道的“婢女”，使宗教同样成为替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服务的工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为序。

林金水

丁酉寅月于闽侯金桥花园自乐斋识

目 录

中、西、日三维关系下的东北基督教（代序）	i
导 论	1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基督教	24
一、社会环境	24
二、发展概况	28
三、教派体系	36
四、政治应对	48
本章小结	53
第二章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基督教会	55
一、中国教会的救亡言行	55
二、卢沟桥事变前中国教会和、战之争	61
三、传教士的态度	68
四、合力抗日态势的形成	74
本章小结	80
第三章 日本基督教界对日军侵华的态度	82
一、政治处境	82
二、和平言行及其本质	88

三、协力侵华终成主流·····	95
四、民族主义与和平主义之两难·····	102
本章小结·····	109
 第四章 日本针对东北基督教的调查与法规·····	110
一、日本使领馆的早期调查·····	110
二、间岛朝鲜人问题·····	114
三、针对西方基督教会的调查·····	121
四、日伪政权宗教法案的演变·····	127
五、伪满洲国基督教政策与法律强制·····	135
本章小结·····	140
 第五章 日伪政权对东北教会的初步掌控与改造 (1931—1941)·····	141
一、特务监控何时休·····	141
二、政治打击与精神强制·····	147
三、基督教组织初步整合·····	156
四、伪满洲国与日本教会蜜月期·····	166
本章小结·····	174
 第六章 日伪政权政教体系的最终形成与强化 (1941—1945)·····	175
一、东北教会再整合·····	175
二、“满洲基督教会”的角色·····	180
三、东北教会的“战争协力”·····	184
四、天主教与政治的独特性·····	190
本章小结·····	198

第七章 伪满洲国基督教事业之历史命运	200
一、传教事业由盛转衰	200
二、教育事业性质变异	210
三、出版事业中的政治元素	223
本章小结	234
结 语	236
参考文献	263

导 论

一、问题的缘起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东北沦陷时期的基督教，该时段东北基督教的境遇、变迁、发展、衰落将是笔者讨论的重点。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角度讲，该主题涉及抗战时期中国基督教区域史领域。著名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强调“区分”（differentiation）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要“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地方历史的研究”。^①他认为只有通过区分才能对中国历史现实取得一幅纹路细密、轮廓分明的画面。中国地方史专家隗瀛涛也曾指出：“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②近代来华差会宗派众多，传教范围遍布各地，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不尽相同，各地教会发展必然存在差异。只有全面了解各地基督教的特点，才有可能相对准确地把握基督教在华整体情况，总结出普遍发展规律。同时，近代来华差会大都有自己的传教区，在特定地域内史料相对集中，将中国基督教史分地区研究更具可操作性，有利于研究的深入。近十年来，东北基督教史研究从最初成果寥若晨星，到目前已经有几部专著、数篇硕博论文、数十篇学术论文的规模，可谓进展迅速，这正是在上述研究旨趣指引下不断推进的

①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65页。

② 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序言。

结果。

但是，本书并非仅关注东北教会，而是试图解析日本侵华战争大背景下更为宏大的问题。本书的最终落脚点，意在以伪满洲国基督教为个案，探讨日据沦陷区政教协同体系的建构过程和形成机制，揭示日本本土的宗教政策和政教关系对沦陷区宗教及社会的影响，分析日本宗教组织在沦陷区宗教控制和社会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关注该问题的初衷，旨在通过宗教社会史的研究路径，推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换言之，不仅仅研究基督教本身，而是将基督教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框架下，考察教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双方对彼此的影响。笔者较为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近代中国的政教关系，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教关系和宗教发展。

1931—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时期的中国基督教史，有分量的成果数量有限，现有成果对许多基本史实语焉不详，尤其是沦陷区的基督教状况，研究几近空白。而这段历史涉及非常独特的政教关系，可以反映出宗教以外非常丰富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且日本侵华对中国基督教的特定时段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极具研究价值。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并非不察，而是因为该时段中国基督教会遭遇严重挫折，相关资料极为稀缺。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传教士绝大多数遭到逮捕，素有保存文献传统的基督教会文本中断，致使这一研究难以为继。不过，虽然相关资料稀少零散，但凭借现有史料仍可以梳理历史梗概和部分细节。尤其需要提及的是，近几年日本外务省档案和其他英、日文文献批量公布，以及各类西文数据库的开放，为该项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可能。

笔者进一步发现，伪满洲国时期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政教关系并非个案，中国、朝鲜、东南亚等日据沦陷区与此大同小异。不仅基督教，当时各大主流宗教均有共性。这些共性可以概括出某种模式，亦即遍布于整个沦陷区的“政教协同体系”。“政教协同体系”是笔者下的一个定义。“协同”一词在当时日本官方用语中经常出现，含义与汉语大致相同，指的是互相配合或一方对另一方的协助。“政教协同体系”是对日据沦陷区政教关系的一种表述，偏重于宗教对政治的协助。笔者认为，日本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在各沦陷区建构起一套具有共性宗教控制系统，并迫使这套系统服务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本书以基督教为例，实则偏重于新教，部分章节涉及天主教，较少谈及东正教，这种安排主

要是基于书稿本身的侧重点。

沦陷区的这种政教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沦陷区与日本本土殖民侵略系统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是其侵略网络中的一个分支。从日本政府的角度看，各种控制手段和组织建构模式被广泛施加于沦陷区社会各个层面，并非直接针对宗教团体。但是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宗教团体往往具有跨国性，同一宗教的信徒可能同时存在于日本和沦陷区。这种纽带关系在和平年代可以增进双方的友谊，在战争年代一方面使交战双方的宗教团体因政治而发生分裂；另一方面也为日本人控制沦陷区宗教提供了便利。日本宗教人士往往被派往沦陷区的同宗同派中，为日军控制沦陷区提供方便。宗教本身也具有特殊性，它蕴含的力量往往是超世俗的，宗教一旦与政治相结合，往往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日本政府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宗教及其庞大的信徒群格外重视。基督教在各种宗教中的角色更为特殊，日本人认为它的背后潜伏着西方政治势力，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沦陷区都是严密监控的对象。尤其是在神社参拜问题上，因与基督教不拜偶像的教义相冲突，基督徒或明或暗给予抵制，这更加重了日本政府的疑心。因此，战时基督教的政治境遇往往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太平洋战争之后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沦陷区基督教会中包含了西方传教士、日本传教士、中国基督徒、日本政府、伪政权等多方利益的互动和博弈，反映出更多的问题。因此，虽然笔者的研究着眼于各类宗教，但仍然以基督教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样本。

从历史的角度看，本书有助于增强学界对侵华时期日本及沦陷区政教关系的认识，增强学界对日本及中国东北基督教的了解。本书与近代日本史、东北地方史、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日本侵华史、亚洲基督教史等诸多领域皆有关联，对这些领域的研究无疑会有所助益。同时，从宏观视野考察相关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战时亚洲政治流变和宗教变迁关系的理解。从现实的角度看，有助于增强我们对日本利用宗教侵华问题的认识，加大反击日本右翼美化侵略的力度。本书将揭露日本利用基督教对沦陷区进行宗教控制的特殊手段，揭露日本宗教政策和政教关系在沦陷区的移植方式，用铁的事实纠正日本学界的错误观点，弥补我国学界对日本利用宗教侵华问题认识的不足，对日本右翼予以有力回击。

二、学术史回顾

本书一方面考察伪满洲国时期基督教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探讨沦陷区的政教关系和宗教生态，因此除梳理伪满洲国基督教史外，沦陷区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历史亦应详细考述。当然，与之相关联的日本本土的政教关系、中国敌后宗教界的政治生态同样是本书的重点，但学界已经就后两方面的研究作了较全面梳理，在此从略。^①

（一）沦陷区政教关系与日本教会的介入

中国学界对日本利用宗教侵华问题已有广泛关注。一般的共识是，日本对沦陷区宗教实行全面管控，日本人利用中国宗教作为服务于其对外侵略的工具。也有学者关注到日本宗教人士在侵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沦陷区宗教的政治生态。但多数研究的关注点或此或彼，将日本与沦陷区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内在关联的研究数量寥寥。^②沦陷区基督教史的研究状况与其他宗教大致略

^① 参见 A. Hamish Ion, *The Cross under an Imperial Sun: Imperialism, Nationalism, and Japanese Christianity, 1895-1945*, in Mark R. Mullins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Boston: Brill, 2003, pp. 69-100. 王淼：《国内外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基督教研究概述》，《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2期。

^② 相关研究涉及各种宗教，佛教代表性的有何劲松：《近代东亚佛教——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为线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何劲松：《伪满期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3期；李庄：《满铁利用日本佛教对中国东北进行文化侵略》，《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神道教如洪军，董辽：《伪满洲国的“惟神之道”》，《沈阳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韩大梅：《论神道教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过程中的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伊斯兰教如丁明俊：《日本在西北建立“回回国”阴谋的失败——兼论宁马绥西抗战》，《回族研究》1995年第3期；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刘春英：《东北沦陷时期的伊斯兰教》，《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刘春英：《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政权的伊斯兰教政策》，《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1期；康佳：《中日战争期における日本の対回族政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其他宗教的如邵雍：《日寇利用中国会道门侵华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王若茜：《东北沦陷时期的日本宗教》，《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李英武：《东北沦陷时期的民间宗教与秘密结社》，《日本研究》2002年第1期；王若茜：《东北沦陷时期的道教》，《日本研究》2001年第4期。综合研究包括：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吴丽华：《近代日本利用宗教侵华及其对中国宗教文化的破坏》，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编：《大连近代史研究》第4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姚洪卓：《日本侵华战争中对宗教的利用》，《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3期；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王晓峰《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宗教侵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等。基督教相关研究下文将重点提及。在这些成果中，何劲松和忻平的研究比较注意日本本土与沦陷区宗教政策及佛教组织的关联，余者涉及较少。

同,中国学界的探讨主要在沦陷区域内。不过沦陷区政教关系与日本本土宗教组织及政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基督教传播具有国际性特点,这些成果或多或少涉及日本的政教关系。

通史著作方面,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中谈及抗战时期基督教时,大略介绍了沦陷区基督教的生存状况,虽然对传教士的评价有待商榷,但提供了一些线索,如日本基督教领袖访华情况等。^①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社会》,谈到战时中国基督教会的遭遇与转型,对日本在沦陷区的宗教政策的概括较为精准。^②罗冠宗在《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中,用较大篇幅专论“九一八”事变后沦陷区传教士的活动,对中日基督教领袖会晤、沦陷区传教士的表现、中国基督徒的态度等都有描述,虽然观点值得商榷,但在史实方面提供了许多新的信息。^③台湾学者查时杰的《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对抗战时期教会活动的评论较多,也大略涉及沦陷区的情形。^④另有部分专著大致谈到相关情况,不过史实和结论方面增补有限。

近年来,一些专题研究开始分区域和从不同角度考察沦陷区基督教的政治境遇。王淼的博士论文《华北沦陷区基督教会研究——以卫理公会为中心(1937—1945)》是这一研究的力作。该文在爬梳大量原始档案的基础上,以华北沦陷时期卫理公会为个案,探讨基督教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政教互动和生存状态。作者将全面抗战分为三个阶段,分述各个阶段政教关系的特点和教会的状况。该文的特色在于作者并未对教会与日本合作问题作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引用和发展了“灰色地带”的理论,试图理解当事人的特殊处境,认为政治高压下基督教仍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政治抗争的能力,为沦陷区政教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⑤陈智衡的《太阳旗下的十字架——香港日治时期基督教会史(1941—1945)》是探讨沦陷时期香港基督教的代表作,文章考察了香港沦陷三年多时间里基督教的发展情况。作者指出,日本将国内的宗教团体法引进香港,结合在台湾普遍实行的皇民化运动,对相关基督教各派进行全面整合和系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③ 罗冠宗主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实述》,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④ 查时杰:《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3年。

⑤ 王淼:《华北沦陷区基督教会研究——以卫理公会为中心(1937—1945)》,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统控制，在港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遭遇政治迫害，教会事业受到严重冲击，进入一个低迷和徘徊阶段。日本的教会合一运动政治属性极强，战后联合教派再度分裂。^①台湾被日本长期占领，但卢沟桥事变后呈现出新的特点，与中国内地和香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学界对此并无专著讨论，但台湾通史著述中可见一斑。^②

日本在沦陷区建立基督教团是宗教控制的经典模式，顾卫民较早谈及华北沦陷区中华基督教团的情形，虽然并未展开，但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后孟国祥在《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一文中，对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情况和日本牧师的活动有较多论述。^③解成和吴丕清的《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在探讨抗战时期河北宗教情况时，同样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列为重要内容。霍培修的《沦陷时期的华北基督教团》则论述了华北基督教团的创建过程、运作机制、政治协同等问题。沈天然等口述的《武汉沦陷期间的华中基督教团》对华中基督教团的史实有诸多描述。^④邢福增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各地档案馆的原始文献，重新梳理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史实，并重点探讨以王明道为代表的中国基督徒在日本强迫入团的政治高压下的表现和心路历程，颇有学术价值。^⑤宋军和胡卫清的两篇文章分别详细考察了日军在教团组建过程中的影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及青岛市分会的发展情况。他们大量使用日本外务省原始档案，将教团幕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是该问题研究的标志性成果。^⑥徐炳三的《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一文在探讨日本基督教教会侵

① 陈智衡：《太阳旗下的十字架——香港日治时期基督教会史（1941—1945）》，香港：宣道出版社，2009年。

② 参见李政隆：《台湾基督教史》，台北：天恩出版社，2004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历史委员会编：《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南：基督教在台宣教百周年纪念丛书委员会，1965年。

③ 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④ 三篇文章或刊载于文史资料，或发表于网络，但其提供的信息和论述方式，具备学术研究的特征。参见霍培修：《沦陷时期的华北基督教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解成，吴丕清：《抗日战争中的河北宗教界》，参见网址：<http://www.xslx.com/htm/shgc/zgls/2005-10-23-19339.htm>（2005-10-23）；沈天然，李叔方，胡学汉：《武汉沦陷期间的华中基督教团》，《湖北文史资料》第3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⑤ 邢福增：《王明道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沦陷时期教会人士抵抗与合作的个案研究》，《建道学刊》2002年第17期。

⑥ 宋军：《从抗战时期华北日军对基督教政策的演变看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成立》，李金强，刘义章编：《烈火中的洗礼——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教会》，香港：宣道出版社，2011年，第197—220页；胡卫清：《“自立背后”：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及青岛市分会简论》，第7届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讨会，香港，2011年。

华责任的同时，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各地建立教团的史实，并关注到沦陷区教团与日本国内教会合一运动的关联。^①王淼和陈智衡的论文中，都用相当大的篇幅探讨华中基督教团。日本侵华时期台湾同样出现教团联合现象，前述学者在综论台湾基督教史时，对此有所涉及。上述成果表明，学界对沦陷区基督教政治性联合的基本史实已经有所认识，并对其内部机制有了一定的探讨，但更多细节，尤其是与日本本土基督教会合一比照和关联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沦陷区传教士的处境也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多篇论著涉及南京沦陷时期的传教士群体，章开沅对该课题的研究居功甚伟。他利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所藏贝德士文献，描述了一个为中国人民贡献甚多、却鲜为人知的传教士群体——“南京帮”。这个以金陵大学教授、传教士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为首的群体，记录和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诸多细节。他们在谴责日军暴行的同时，全力投入到中国难民救济工作中，保障了大批国人的生命安全。章开沅的系列成果既是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化，又是对南京传教士群体的热情讴歌。^②除贝德士外，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美国女传教士华群（Minnie Vautrin）也受到较多关注，在南京沦陷期间，她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上万女性免遭日军侵害，其事迹随着《魏特琳日记》的出版而广为人知。以该日记为史料，学界推出两部较有分量的传记和数篇论文。^③彭剑推出系列成果，对南京传教士的心态展开研究，更为全面精细地展示出这一群体的感人事迹和心路历程。^④南京的部分传教士曾参与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工作，王卫星系统考察了这一组织的创立过

① 徐炳三：《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

② 参见章开沅：《让事实说话——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0期；章开沅：《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章开沅：《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宪文主编，章开沅编译：《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

③ “魏特琳”是后人女传教士 Minnie Vautrin 名字的直译，华群是其来华时用过英文名。参见〔美〕明妮·魏特琳著，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魏特琳日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两部传记分别为：胡华玲：《金陵永生魏特琳女士传：南京大屠杀保护中国妇女的活菩萨》，台北：九歌出版社，1997年；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魏特琳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论文大多为对《魏特琳日记》的评述，或该日记中记载的南京大屠杀的评论，在此从略。

④ 参见彭剑：《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宁美国传教士的心态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彭剑：《角色紧张与南京大屠杀期间外籍人士揭露日军暴行的延误——兼驳松村俊夫的“豹变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彭剑：《被忽视的受害者——南京大屠杀中美国传教士的另一面相》，《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彭剑：《仇日乎，反日乎——试析南京大屠杀期间美国传教士对日军之态度》，《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